

王國維的教育思想

周 明 之

- 一、非功利的教育觀
- 二、人文教育的強調
- 三、對教育政策的建議
- 四、對高等教育的貢獻

王國維(1877-1927) 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有他超然不朽的地位。他是中國最早介紹歐洲唯心論哲學(Idealism)的人，早在1903至1907年間，即譯述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等人的哲學思想、美學觀、文學批評和教育思想等①。不但如此，王氏更因研究西洋哲學進而對中國的價值觀念和哲學思想，作根本而有建設性的批判。在文學方面，也因西方思想的洗禮而有獨具慧眼的創見。

王氏的教育思想，是他研究西方思想的心得和潛心思考的結晶。他在教育方面的文字，也均成於1903至1907年間，數量與他在哲學和文學理論方面的文字（戲曲史的文字不計），等量齊觀，可見教育在他思想上的比重。然而至今討論王氏教育思想方面的文字，仍屬少數，而且內容也欠充實。②本文擬就王氏的教育思想，在現代學術和歷史的時代背景之下，作一深入的分析。

十九世紀末葉，二十世紀初期，中國舉國上下的心血，都投注在國家的革新和富強上。教育的目的，主要是要使個人對國家的富強有所貢獻。也就是說，個人的存在，以他們對國家社會的責任為依歸。因為如此，所以國人所強調的，是社會和

① 梁啟超於1903年2月在新民叢報介紹康德，與王國維研究介紹康德，大致同時。見梁啟超，「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學說」，飲冰室文集，冊8卷46（臺北，中華，1970）卷13，頁47-66。不過王氏對康德及其他西方思想家了解的深度，則遠非梁氏所能望其項背。

② 如李國鈞，杜成憲，「試論王國維的教育思想」，吳澤主編，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第二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1987），頁527-544；Joey Bonner, *Wang Kuo-wei: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1-44.

國家的羣體性；個人獨立的個性的發展，往往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這種以國家社會為主的功利主義，本是儒家的中心思想之一。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世變日亟，這種功利致用的思想和當時高漲的民族主義相應和而使兩者都同時達到高潮。我們可以說，十九世紀末期和二十世紀初期，一切教育的指標，都為民族富強和經世致用的前題所決定。

王國維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要在這一時代背景之下，才顯出它不尋常的意義。他的教育思想，不以經世致用為目的，更沒有急功近利的心情，所以能以思想的內在價值為其去取的標準。王氏是中國近代史上，極少數不受民族主義的浪潮衝擊的一人，所以他的思想，沒有渴求中國富強的急躁心情之下而產生的淺薄和現實的短處。他提倡哲學、文學和藝術（art）的重要，不是因為它們可以作為培養民族主義或灌輸道德教訓的工具，而是因為它們在個人身心發展上的重要性和它們所能給我們思想上和精神上的滿足。^③教育的目的，不是在造就國家和社會的齒輪，而是在培養健全的個人。國家的意義，要以它文化思想的發達與否來衡量。這種見解，和時人的看法，南轅北轍，卻也正是王國維在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在實際的教育政策方面，王氏也多能針對時弊，提出新穎的見解。

一、非功利的教育觀

王國維在1903年說，教育的宗旨，「在使人為完全之人物而已！何謂完全之人？謂人之能力，無不發達且調和是也」。^④要達到這一目的，要在體育和心育上均衡發展。體育的重要，不言而喻。心育方面，有智育、德育和美育。「完全之教育，不可不備此三者。」^⑤

我們如果只從抽象的層面看，則這幾句話只是無關痛癢的陳腐之言。當時的國人，千頭萬緒而又沒有明確的現代知識，人云亦云，這一類的話，說過何止千百次了。可是當我們把王氏在教育方面的各種主張細加分析時，便馬上可以看出，這幾句話，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他廣泛的閱讀和慎思熟慮的心血。

王氏對於智育、美育和德育三者並重。在智育方面，他反對功利主義，痛貶時人只知實用的心理。他主張各學科均衡教授而以「無用」的哲學為高等教育各科

③ 這裏所指的藝術，在王氏的文字中，稱為美術，包括音樂、繪畫、雕刻和詩歌等。

④ 王國維，「論教育之宗旨」，教育世界，期 56（1903 年 8 月），收入劉剛強編輯，王國維美論文選（長沙，湖南人民，1987），頁 1。

⑤ 同上註。

之冠。王氏也反對中國本位的排外心理而極力呼籲學問思想之無國界之分。在美育和德育方面，他主張美感的培養和心靈的啟發而反對死板的填鴨式的道德教育。無論在智育、美育或德育方面，王國維都有劃時代的見解和貢獻。

在智育方面，第一點需要說明的，是王國維在科學的領域裏，對於理論知識和實際知識之因果關係的了解。他於1903年說：

溯其發達之次序，則實際之知識常先於理論之知識，然理論之知識發達後，又為實際之知識之根本也。一科學，如數學、物理學、化學、博物學等，皆所謂理論之知識。至應用物理，化學於農工學，應用生理學於醫學，應用數學於測繪等，謂之實際之知識。理論之知識，乃人之無性上所要求者；實際之知識，則所以供社會之要求而維持一生之生活。故知識之教育，實必不可缺者也。⑥

理論知識和應用知識的這種互為因果的關係，在當時西方的知識界，已屬常識性的知識，然而在當時中國的知識界，有這種認識和領悟，則是難得的慧眼。國人爭相強調科學經世致用的功能之不暇，對於科學的理論層面，當然不會有平衡的認識的。當時西方知識最深厚的嚴復（1854-1921），尚且不能擺脫這一層限制。嚴氏於1895年說：

格致之學不先，偏僻之情未去，束教拘虛，生心害政，固無往而不誤人家國者也。……非為數學，……非為力學，質學，則不知因果功效之相生也。力學者，所謂格致之學是也。質學者，所謂化學是也。⑦

嚴復在提倡近代西方科學上，是篳路藍縷的功臣。然而他指出理論科學的重要性的目的，實在是在強調它的實用價值，而在強調理論科學的重要性的本身。所以會有「生心害政」等語。王國維則指出實用科學和理論科學之互為表裏和因果的邏輯，而對於兩者的重要性，卻不以軒輊分。

的確，王氏對於科學，遠不如時人之熱衷和嚮往。國人對科學的狂熱和崇拜，尊之為「賽先生」，是五四時代的事。不過戊戌一輩的人，對於科學的嚮往和強調，則已是不爭之事實。王國維生為戊戌一代，早年在「東文學社」時，對於格致之學，曾經嚮往苦讀。東渡日本之後，又進物理學校就讀。不過這種對於科學神往的時期很短。他潛心研讀哲學之後，對於科學的地位和重要性，即有所修正。他

⑥ 同上註，頁2。

⑦ 嚴復，「原強」，王栻主編，嚴復集，5冊，（北京，中華 1986）第一冊，頁6～7。

在1907年時，把學問分為四大類，即科學、哲學、文學、美術。^⑧ 1911年時又說，「今專以知言，則學有三大類：曰科學也，史學也，文學也」。^⑨ 這裏重要的，不在說明王氏如何將學問分類，而在指出他和一般時人不同，並不把科學視為萬靈丹藥。

王氏雖然把科學和哲學、文學、藝術平等看待，他對科學的熱心，卻遠不如他對後三者的興趣之大。他的文字之中，提到科學之處，寥寥無幾。可是這種態度，只說明他思想的方向和興趣之所在，而並不表示他對科學心存輕視。王氏的思想啟蒙師叔本華認為科學不足以解釋宇宙的根源和人心的動機，所以對於科學方法之功能，有所保留。^⑩ 王氏早在1904年介紹叔本華學說時，也指出叔氏對科學，遠不如他對藝術和直觀知識之重視。^⑪ 不過王氏自己在討論各種學問的重要性時，雖然一再強調哲學、文學和藝術之可貴，卻並沒有貶抑或輕視科學的心理。

雖然如此，可是我們還是要指出，在知識的層次上說，王國維認為哲學是所有學問最高的滿足。而王氏所指的，是純粹思辨的形而上學，而非以國家社會秩序為目的的道德哲學。他的著眼點，是思想的內涵。他在批判奏定學堂章程時，把這一層思想，發揮得淋漓盡致。

清政府為了挽救危亡，於庚子拳亂之後的十年之中（1901-1911），曾作一系列的改革。在這些改革之中，教育始終是中心議題之一。^⑫ 庚亂之後，張百熙（1847-1907）、榮慶（光緒十二年進士）和張之洞（1837-1909）等奉慈禧旨，著手重訂全國的教育計畫。光緒二十九年底（1904年初），三人具奏奏定學堂章程一份，詳論各級各類教育之興革。^⑬ 章程除了參考日本及歐美的學說制度之外，也有不少具奏人的見解。在當時的思想界，章程所建議的，有不少有見地的看法。在輸入西洋和日本的教育制度之下，作者對於如何使新思想和舊傳統有一均衡的發展，頗費了一番苦心思考。概括而言，章程是清代最後十年中的一項重要文獻，有專文分析的必要。

⑧ 王國維，「教育小言十三則」，*教育世界*，期143（1907年2月），收入王國維，*王靜庵文集*（臺南，儒勉，1978）第十則，頁258。

⑨ 王國維，「國學叢刊序」，*王靜庵文集*，頁219。

⑩ Patrick Gardiner, *Schopenhauer* (Baltimore, Maryland, Penguin Books, Inc., 1963) pp. 139-141.

⑪ 王國維，「叔本華之哲學及其教育學說」，*教育世界*，期75（1904年5月）、期77（1904年6月）。收入王靜庵文集，頁131。

⑫ 有關此一時期教育方面的改革，請參考陳東原，*中國教育史*（上海，商務，1936）。

⑬ 張百熙，榮慶，張之洞，*奏定學堂章程*，*湖北學務處*（臺北，臺聯國顯，1970）。

王國維對於現代思想的了悟，比之章程的作者，又有過之。他對於章程各節，批評多於稱譽。他於 1906 年說，章程中的中、小學各節中，有不合於教育理法的，「以世多能知之，能言之，余故勿論」。大學中的醫、法、理、工、農、商等科，「以非予之專門，亦不具論」。他所真正關心的，是大學中的經學和文學兩科。^⑭

王氏認為，經學科和文學科中的一個根本錯誤，「在缺乏哲學一科而已」。「知識之最高之滿足，必求諸哲學。叔本華所以稱人爲形而上學的動物而有形而上學的需要者，爲此故也」。^⑮王氏對於哲學的重視和喜好，當然是出於他的性向和內在的沉思，然而叔本華的哲學，無疑地給了他學理上的肯定。王氏自傳中說：

余之研究哲學，始於辛壬(1901-1902)間，癸卯(1903)春，始讀汗德（康德）之純理批評，苦其不可解，讀幾半而輟。嗣讀叔本華之書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1904)之冬，皆與叔本華之書爲伴侶之時代也。^⑯

王氏爲文批評章程中各節，是 1906 年間的事，與叔氏哲學爲伴侶，已好幾年了。王、叔二氏所謂的哲學，都是探究人生最奧秘的形上學 (metaphysics)。叔本華在他的著作中，反覆說明人類對宇宙的奧秘，對萬物內涵的追求，有「強大而根深蒂固」的欲望。這種形上學的欲求，是人類最獨特的品質。^⑰這種欲望，既然如此根本，而在人生的過程中又如此重要，所以王氏認爲形上學沒有列入奏定學堂章程的科目中，是一根本錯誤。

章程中以大學堂分爲八科：經學科、政治科、文學科、醫科、格致科、農科、工科和商科。^⑱在經學科中，只設有傳統的經學和理學而無現代的哲學門。王氏懷疑反對哲學的人，有的認爲哲學中的某些學說，有害於政治社會的安寧。當時有人認爲，數年以來，「海內自由革命之說」，多源於西洋哲學。對於這一看法，王氏反駁道，他指的哲學，是形而上學，而自由革命等學說，則屬於「政治法律之方面，而不屬於哲學之方面」。^⑲王氏此處所指，不是章程的三作者，而是另有所

^⑭ 王國維，「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後」，*教育世界*，期 118 (1906 年 2 月)；期 119 (1906 年 2 月)。收入王靜庵文集，頁 275。

^⑮ 同上註，頁 276, 277。

^⑯ 王國維，「靜庵文集自序」，王靜庵文集，頁 43。

^⑰ Arthur Schopenhauer, *The World as Will and Representation*, 2 vols.,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E. F. J. Payne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69, II: 162, 160-187.

^⑱ 細節見奏定學堂章程之「大學堂章程」，頁 109-303。

^⑲ 王國維，「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後」，頁 276-277。

控。章程說：

乃近來更有創爲蜚語者，謂學堂設政治一科，恐啟自由民權之漸。此乃不覩西書之言，實爲大謬。夫西國政治之書，固絕無破壞綱紀，教人犯上作亂之事。^{②0}

可見張百熙、榮慶和張之洞等，並未因自由民權之漸而反對現代哲學。則王國維在這一點上，和章程作者的理論基礎雖不同，而結論卻並無二致。

王氏又指出，有人認爲哲學無實際之用途，所以沒有講授的價值。所謂抽象的形上哲學乃無用之學，是重實際的國人共同的看法。章程中特別強調經學與致用的關係：

通經所以致用，故經學貴乎有用。求經學之有用，貴乎通，不可墨守一家之說，尤不可專務考古。研究經學者，務宜將經義推之於實用。此乃羣經總義。^{②1}

以這種致用的心情研究哲學，則毫無實際用途的形上學，當然是不會受到重視的。王氏在爲哲學辯護時，力言其無用之價值：

以功用論哲學，則哲學之價值失；哲學之所以有價值者，正以其超出乎利用之範圍故也。且夫人類，豈徒爲利用而生活者哉！人於生活之欲外，有知識焉，有感情焉。感情之最高之滿足，必求之文學美術；知識之最高之滿足，必求諸哲學。^{②2}

然而面對一心以實用爲務的國人，王國維又不得不指出哲學的「無用之用」，作爲他的辯護工具。所以他又補充說，「自間接言之，則世號爲最有用之學，如教育學等，非有哲學之預備，殆不能解其眞意」。這種無用之用，實是哲學最有價值之處，因爲它是一切人文思想之基礎。所以即令哲學「一無所用，亦斷無廢之之理，況乎其有無用之用哉」。^{②3} 1906年時，國中的知識份子，少有對於哲學的本質，能有如此的了解。

最後，王國維懷疑張百熙、榮慶、張之洞等之不立哲學一科，是因爲他們對於西洋哲學有所畏懼以及對某些中國哲學思想已有先入爲主的成見。王氏說，章程不列西洋哲學，而「周、秦諸子之學，皆在所擯棄，而宋儒之理學，獨限於其道德

②0 奏定學堂章程，頁72。

②1 同上註，頁121。

②2 王國維，「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後」，頁277。

②3 同上註，頁278。

哲學之範圍內研究之」。② 王氏對於章程所載，此處略有誇張曲解，不過他所指章程思想上的弱點，大體是不錯的。章程中奏議的「經學科大學」有十一學科，即周易學門、尚書學門、毛詩學門、春秋左傳學門、春秋三傳學門、周禮學門、儀禮學門、禮記學門、論語學門、孟子學門和理學門。在理學門內，列有「漢、唐至北宋周子以前理學諸儒學派」和「周、秦諸子學派」二課。③ 所以問題不是王氏所說「周、秦諸子之學，皆在所擯棄」，而在於份量的多寡和教授的內容上。章程說，講易時，要以「外國科學證易」，並強調「歷代政治人事用易道見諸施行之實事」。總之，講周易時，「務當於今日實在事理有關繫處，加意考究」。④ 至於理學，則宜「貴實踐而忌空談」，「淺學高談性命」，尤其要避免。⑤ 一言以蔽之，章程一面要以現代科學來證明易學之萬能，一面要以宋、明理學作為道德教育的工具。

王國維對章程的這種態度，有兩個強有力的辯駁。第一點是他反覆再三的，即形上學是一切哲學的基礎，也是通其他各種哲學的門徑。如果經學科大學只一味以歷代政治人事和道德為務，則經學科所授根本談不上哲學的內容。王氏說：

易不言「太極」，則無以明其生生之旨；周子不言「無極」，則無以固其主靜之說；伊川、晦庵若不言「理」與「氣」，則其存養省察之說為無根柢。故欲離其形而上學而研究其道德哲學，不全可能之事也。⑥

因為章程要以科學證易，又要以儒家道德獨尊，所以王國維的第二點，是極力呼籲「博稽眾說，而唯眞理之從」的態度。⑦ 這一點和學問不以有用無用分貴賤，同是王氏思想的兩大支柱。下面的一段話，成於1906年，無疑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文獻之一，也足以建立王國維在中國思想史上不朽的地位：

周、秦諸子之說，雖若時與儒家相反對，然欲知儒家之價值，亦非盡知其反對諸家之說不可，況乎其各言之有故，持之成理者哉！今日之時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時代，而非教權專制之時代。苟儒家之說而有價值也，則因研究諸子之學而益明；其無價值也，雖罷斥百家，適足滋世人之疑惑耳。吾竊嘆尚書張之洞之知之與杞人等也。昔日杞人有憂天墮而厭己者。尚書之憂道，無

② 同上註。

③ 奏定學堂章程，頁119、128。

④ 同上註，頁122。

⑤ 同上註，頁85-86。

⑥ 王國維，「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後」，頁278-279。

⑦ 同上註，頁277。

乃類是！若夫西洋哲學之於中國哲學，其關係亦與諸子哲學之於儒教哲學等。今卽不論西洋哲學自己之價值，而欲完全知此土之哲學，勢不可不研究彼土之哲學。異日發明光大我國之學術者，必在兼通世界學術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決也。[◎]

王氏以上所說，把張之洞等的隱憂，一語道破。章程奏請設立經學科大學，卽是要把孔、孟之道，提升到獨尊的地位，並以之為立國的最高道德準則。章程的「學務綱要」，「中、小學堂宜注重讀經，以存聖教」一項說：

外國學堂有宗教一門，中國之經書卽是中國之宗教，若學堂不讀經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謂「三綱」、「五常」者，盡行廢絕，中國必不能立國矣。學失其本則無學，政失其本則無政。其本既失，則愛國愛類之心亦隨之改易矣，安有富強之望乎！[◎]

章程所擬各節，便是要「學堂中決無荒經之人，不惟聖經不至廢墜，且經學從此更可昌明矣」。[◎]堯、舜、孔、孟之道，既是「聖經」，則不同的見解，當然是不能容納的。章程說：

公羊家後世經師之說，多有非常可怪，不合聖經本義之論，如新周王魯以春秋當新王之類，流弊無窮，適為亂臣賊子所藉口，關係世教甚鉅。近來康、梁逆黨卽是依託後世公羊家謬說，以逞其亂逆之謀。故講公羊春秋者，必需三傳兼講，始免藉經術以禍天下之害。[◎]

王國維對於章程所議各節，不但從學術自由，而且也從思想的發展方面立論反駁。他說：「宗教者，信仰之事而非研究之事。研究宗教，是失宗教之信仰也。若為信仰之故而研究，則又失研究之本義」。[◎]如果以讀聖經的心情來讀孔、孟之書，則已先下了結論，又有何研究之必要呢？所以

尊孔、孟之道，莫若發明光大之，而發明光大之道，又莫若兼究外國之學說。今徒於形式上置經學於各分科大學之首而不問內容之關係如何，斷非所以尊之也。[◎]

◎ 同上註，頁279。

◎ 奏定學堂章程，頁55-56。

◎ 同上註，頁59。

◎ 同上註，頁125。

◎ 王國維，「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後」，頁282。

◎ 同上註，頁281。

基於上述的種種理由，王氏提議說，經學科不應為一獨立學院而只應是文學院下的一個系，和哲學、史學、中國文學、西洋文學等四個科系，立於平等之地。^{⑥6} 王氏所議文學院的組織法，從今天看來，已屬常識性的見解。今日國內的大學，經學置於中國文學系內，其餘則無一不是王氏八十餘年前的設想。^{⑥7}

王國維的思想，綜而觀之，提出了幾點極為重要的根本性問題。第一，一個社會的教育，是否只在訓練「有用」的專材，而對於「無用」的科目則置之不理？如果以世俗的有用無用為標準，則在思想實際的民族之中，在現實逼迫、生活窮困的社會裏，文學、音樂、哲學、藝術，便無容身之地了。而人的身份、價值和尊嚴，也都在有用無用的尺度下由社會取決了。如此的社會，是否能有平衡的發展？而個人在這種價值觀念之下，情緒是否能得到適度的舒展，興趣是否能得到發展，而心靈、智慧和眼光，是否能超越最切近現實的層面？王氏針對這種潮流而提出他無用之學的看法。我們下一節討論他對美育的見解時，這一點將更為明顯。

王氏所提出的另一個問題，是孔、孟的儒家思想在二十世紀的現代中國所應佔有的地位問題。換言之，二十世紀的中國，是否仍應以一成不變的孔、孟之道，作為立國的最高準則，定於一尊，而對於不同的觀點，則以異端視之？王氏是二十世紀初年呼籲獨立思辨和學術自由最力的人。在力主學術自由時，他所強調的，只是一個態度的問題而不涉及任何一派學說的內容。他所要求的，只是一種兼容並蓄的風氣，使得各種學說，相互對比，而各人有一自由取捨的餘地。王氏的著作中，批評及問難中國學術思想之處甚多，卻從無一處攻擊中國思想傳統。五四時代於感情激動的譏諷和辱罵傳統的心理負擔，在王國維身上是完全找不到的。他在討論問題時，從問題的概念性入手而不及於問題的細節。所以他雖然力主中國不應以信仰宗教的心情和態度崇拜孔、孟之道，卻無一語批評孔、孟之道的本身。百年以來，批判中國傳統的人之中，以王國維的態度，最稱得上致中和。

^{⑥6} 同上註，頁283-284。

^{⑥7} 王氏其他的具體建議，也都顯出他與眾不同的眼光。此處可以他對地理學科的看法為例。奏定學章程，頁157-160，擬有中外地理學門一科。王氏說：文學科大學中之有地理科，斯最可異者已。夫今日之世界，人跡所不到之地殆少，故自地理學之材料上言之，殆無可云進步矣。其尚可研究之方面，則在地文、地質二學。然此二學之性質，屬於格致科而屬於文學科。今格致科大學中既有地質科矣，則地理學之事，可附于此科中研究之。若別置一科，不免有重複之弊矣。王國維，「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後」，頁283）。近幾十年來，世界各國的大學，都在逐漸取消地理系。此一學系，今日在大規模的第一流大學中，已不多見。王氏眼光之不凡，歷史是最好的證據。

孔、孟之道，既然不應以宗教的心情崇拜，則各種不同的學說，都應以平等的態度待之。對於西洋學術，尤其不應非理性地排斥。王國維所說的「異日發明光大我國之學術者，必在兼通世界學術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實是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界最深刻的預言。世界上任何一門學問，都有一個比較和立論的基點。十九世紀末期以來，中國的傳統思想和文化，都是在西方的概念和分析方式之下研究的，至少在研究中國傳統時所提出的問題，是因西方的概念和分析方式而引導出來的。余英時說得好：

今天我們對中國的思想傳統進行現代的詮釋，自然不能不援引西方的概念和分析方式。理由很簡單：現代詮釋的要求即直接起於西方思想的挑戰，這和宋、明新儒學之起於對佛教的回應，基本上是相類似的。[◎]

當然，近代西方思潮對中國文化的衝擊，遠過於佛教對中國文化的挑戰。李鴻章說西方文化所帶來的，是兩千年所未有之變局，絕非誇張之語。我們可以說，百年以來中國所有的價值觀念，都是在西方觀點的比照之下而定的。西哲懷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 說：

迷途的旅人不必問，「我身在何處」？他真正要曉得的是他置身以外的地方都在那裏。他有他自己的軀體，只是不知道其他的地方何在。[◎]

這一個比喻，恰當不過。十九世紀末葉，中國在西方勢力的席捲之下，成了迷途的旅人，所以要在掌握了西方的方位之後，才能重新界定自己的旅程。

而王國維便是界定中國新的旅程的首席功臣之一。晚清談西學的人，比比皆是，然而從最嚴格的標準來看，則只有嚴復和王氏是了解西學最深刻的。嚴氏自1898年起，十一年內，以翻譯的方式、致用的心情，在西方概念的指引之下，分析中國不能致富強的原因。[◎]王氏緊隨嚴氏之後，於1903至1907年間，從非功利的觀點，用西方哲學的概念，詮釋中國文學、哲學的傳統和思想個性的特徵。王氏在這一方面的工作，是開山的貢獻。內容方面，此處不暇討論。不過我們可以說，他1906年批評奏定學堂章程時所下的結論，「異日發明光大我國之學術者，必在兼通世界學術之人」，不但是夫子自道而已，而且也是替他幾十年以後的中國學術界所

◎ 余英時，「自序」，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1987），頁4。

◎ 轉引自 Joseph R.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8-65) I: xxvii.

◎ 關於嚴復的思想，最有系統的分析是 Benjamin I.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下的先驗性的預言。在這八十年裏，絕大部分國人對中國思想文化的反省，都是在西方概念的影響之下進行的。即使是一心為中國傳統辯護的人所提出的問題，也都是在西方概念的影響之下才能提出的問題。

王國維之所以能有如此的創見，當然是由於他過人的智慧。這種智慧，有多種不同的品質，其中之一是他能不為當時高漲的民族主義的洪流所動。所以他在分析比較中西思想時，能以平靜而不動感情的態度，從概念的分析入手而不在枝節上糾纏。我們放眼觀察王氏一代的人，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在研究學術時，如此不為民族情感的包袱所累的。因為他的心情平和，所以他從不以吸收西洋思想為恥；在分析中國思想時，既沒有過份激動的挑剔，也不作義和團式的感情自衛。他在1911年有下面的一段話，說明學無中西國界之別或有用無用之分：

事物無大小，無遠近，苟思之得其眞，紀之得其實，極其會歸，皆有裨于人類之生存福祉。已不竟其緒，他人當能竟之，今不獲其用，後世當能用之。此非苟且玩愒之徒所與知也。學問之所以為古今中西所崇敬者實由於此。凡生民之先覺政、治教育之指導、利用厚生之淵源，胥由此出，非徒一國之名譽與光輝而已。世之君子，可謂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者矣！^①

王氏放眼人類，不分中西，不以功利為目的的教育觀，在這幾句話裏概括盡淨。

二、人文教育的強調

王國維一本他強調人文思想的精神，同時也強調美育在教育上的價值。他把美育放在和智育、德育同等的地位上，但是特別提醒美育的重要，因為「德育與智育之必要，人人知之。至於美育，有不得不一言者」。^②王氏是最早介紹西方美學思想到中國的人。他的見解和成就，將另有專文論析。此處僅就他的美育思想，提出討論。

王國維在1903年說：

人心之動，無不束縛於一己之利害。獨美之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於高尚純潔之域，此最純粹之快樂也。……要之，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感情發達，以達完美之域；一面又為德育與智育之手段。此又教育者所不可不留意

① 王國維，「國學叢刊序」，王靜庵文集，頁222-223。

② 王國維，「論教育之宗旨」，頁2。

也。④

王氏在此除了重申他的非功利觀之外，另有兩點，值得我們引申的。一是美之爲物，使人入於高尚純潔之域。此一高尚純潔之域，也便是人的感情達到完美的境界。第二是美育是德育和智育的手段。這兩點有其內涵上的矛盾之處。王氏既提出高尚純潔之域，則他顯然是以美的本身爲其最終的目的。但是他同時又說，美育「爲德育與智育之手段」，那麼美育便成了從屬的次要地位了。我們下面的討論，不是要看王氏如何解決這一極端複雜的哲學難題。在西方哲學史上，美育與德育之間的微妙關係，千年以來尚無定於一尊的解釋。王氏對於這一問題的錯綜複雜，有相當的掌握和了解，然而他並沒有哲學上原始性的貢獻。我們此處所要分析的，是王氏在討論美這一問題時，如何強調美育在教育上的重要性。

王氏所說美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於高尚純潔之域，源於叔本華的美學哲學。叔氏在他的著作中，反覆說明美所導致的忘我和無欲的純粹之境，並詳爲分析各種藝術如音樂、詩歌、雕刻等的內容和價值。⑤在近代美學的哲學裏，叔本華是重鎮之一。王氏在自傳中說：「去夏（1904年夏）所作『紅樓夢評論』，其立論……全在叔氏之立腳地」。⑥而他在「紅樓夢評論」中說：「美術之價值，存於使人離生活之欲而入於純粹之知識」。⑦這與叔氏所說，毫無二致。其實王氏的「紅樓夢評論」和其他有關美學上的著述，都是在引申和發揮叔氏的美學思想。我們甚至可以說，因爲他對叔氏的美學思想的了悟深刻，所以才有石破天驚的「紅樓夢評論」之作。又因爲王氏對於美育的了解，所以他才反覆強調美育在人生過程上的重要。

關於美育可以爲德育之助，王國維於1904年說：

泰西自雅里大德勒（案：即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以後，皆以美育爲德育之助。至近世譙夫志培利赫（Shaftesbury, 1671-1713）、啟孫（Adolf Zeising, 1810-1876）等皆從之。及德意志之大詩人希爾列爾（案：即席勒 Friedrich Schiller, 1759-1805）出而大成其說。⑧

王氏此處的觀察是有根據的。在西方哲學思想中，美術的本身是否即是人類心智最

④ 同上註，頁2～3。

⑤ Schopenhauer, I: 184-267.

⑥ 王國維，「靜庵文集自序」，頁43。

⑦ 王國維，「紅樓夢評論」，教育世界，期76（1904年6月），期77（1904年6月），期78（1904年7月），期80（1904年8月），期81（1904年8月）。收入王靜庵文集，頁103。

⑧ 王國維，「孔子之美育主義」，教育世界，期69（1904年2月）。收入劉剛強編輯，王國維美論文選，（長沙，湖南人民，1987）頁5。

高的表現或者僅只是德育之助，是一件聚訟不清的大問題。誠如王氏所說，西方不少重要的美學家，的確以道德的眞理為其審美的最後標準。柏拉圖 (Plato) 認為，藝術作品要對社會和個人行為有良好影響的才算上乘。^⑧康德的美學的一部分和他的道德觀是分不開的。他認為美是道德的象徵(*beauty as the symbol of morality*)因為優美的事物很自然地會帶出一種道德的美感情緒，而我們對美的鑑賞力會導致我們一種習慣性的道德愛好。^⑨席勒認為美育的目的之一，是使人類訴諸感官的 (*sensuous*) 氣質，轉化為理性的 (*rational*) 和道德的 (*moral*) 氣質。^⑩

不過這裏要指出，王國維雖然認為美育和德育有直接關係，美育應為德育之助，可是另一方面，他對於美術的獨立性和內在價值卻又萬般重視。他在「孔子之美育主義」一文中，痛斥中國文化中之功利主義：

嗚呼！我中國非美術之國也。一切學業，以利用之大宗旨貫注之。治一學，必質其有用與否；為一事，必問其有益與否。美之為物，為世人不顧久矣。故我國建築、雕刻之術，無可言者。至圖畫一技，宋、元以後，生面特開，其淡遠幽雅，實有非西人所能夢見者。詩詞亦代有作者。而世之賤儒，輒援「玩物喪志」之說相詆，故一切美術，皆不能達完全之域。美之為物，為世所不顧久矣、庸距知無用之用，有勝於有用之用者乎？所以我國人審美之趣味之缺乏如此，則其朝夕營營，逐一己之利害而不知返者，安足怪哉！安足怪哉！^⑪

王氏在音樂教育上的見解，可以看出他對美育本身的內在價值之重視。王氏對當時音樂研究之勃興和小學設唱歌一科，認為是可喜的現象。^⑫早在1904年，奏定學堂章程即奏請各級學校加強音樂教育。^⑬章程的作者建議中、小學堂設唱歌音樂一門，「本古人絃歌學道之意」。可是「中國雅樂久微，勢難仿照」，只有本明代王陽明「訓蒙教約，以詩歌為涵養之方，學中每日輪班歌詩」，將「有益

^⑧ Monroe C. Beardsley, *Aesthetics from Classical Greece to the Present: A Short History*(Alabam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75), pp. 46-50.

^⑨ 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Judgement*, translated by J. H. Bernard (New York, Hafner Publishing Co., 1972), pp. 196-202.

^⑩ Friedrich Schiller, *O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Man in a Series of Letters*, translated by Reginald Snell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 1965) pp. 27-28、72、92、118、119-123.

^⑪ 王國維，「孔子之美育主義」，頁7。

^⑫ 王國維，「論小學校唱歌科之材料」，教育世界，期148（1907年5月）。收入王靜庵文集，頁289。

^⑬ 奏定學堂章程，頁371-373、408-409、456-458、496-497、594-596。

風化之古詩歌列入功課」。⑤4下面有關小學音樂教育一段，可以看出具奏的具體內容：

初等小學堂讀古詩歌，須擇古歌謠及古人五言絕句之理正詞婉能感發人者。

惟只可讀三、四、五言，句法萬不可長，每首字數尤不可多。遇閒暇放學時，即令其吟誦，以養其性情，且舒其肺氣，但萬不可讀律詩⑤5。

章程建議中，小學以古歌謠及古人五言絕句為唱歌科之主要內容，而不及律詩，是十分開明的立場。王國維受了西方哲學的薰陶，對音樂的認識，比章程的作者，更深了一層。王氏在討論音樂的形上學的意義時，特別提出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和叔本華。⑤6畢氏和叔氏是西方音樂學理的重鎮，王氏以二氏為他討論的對象，可見他對音樂的哲學，至少有基本的認識。畢達哥拉斯是古希臘的哲學家和數學家。他和他學派的人，在蘇格拉底(Socrates)和柏拉圖之前，已經發展了一套初步的音樂美學的理論⑤7。叔本華對音樂的分析，精微而詳盡，是近世音樂學理方面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他說音樂用以表達的，是最高層次的超越時空的語言(*universal language*)；它是人的意志最直接的客觀化。因為如此，所以音樂所反映的，是生命的精髓，而它的影響，深入人性的最深層。⑤8

章程奏請在全國各地中、小學設唱歌科的本意，當然不在探究音樂的形上學的意義。王國維了解章程的本意，所以他說，關於音樂的形上學，「姑不具論，但就小學校所以設此科之本意言之」。⑤9小學校設唱歌科的目的，其一是以之作為修身科的補助。對於這一點，王氏在大前題上是不反對的，不過在做法上，則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說音樂最重要的方面，在其形式而不在其內容。所謂內容，是指歌詞而言。根據叔本華的看法，音樂既是最高層次的超越時空的語言，則器樂(*instrumental music*)才是表達這種語言的最佳形式。如果音樂太依賴歌詞或者過於符合史實，那麼音樂所表達的，便不是它自己的語言了。⑥0王氏了解這一層的重要性。他說：「雖有聲無詞之音樂，自有陶冶品性，使之高尚和平之力，固不必用修身科之材料為唱歌科之材料也」。所以他認為唱歌科不應「徒以乾燥拙劣之辭，述道德上之教

⑤4 同上註，頁372。

⑤5 同上註。

⑤6 王國維，「論小學校唱歌科之材料」，頁289。

⑤7 Beardsley, pp. 27-8.

⑤8 Schopenhauer, I: 256-257, 261-262; II: 447-457.

⑤9 王國維，「論小學校唱歌科之材料」，頁289。

⑥0 Schopenhauer, I: 261-262; II: 448-450.

訓」。當然這並不是說，歌辭絕不能用，不過用歌辭時，應考慮「古詩中之詠自然之美及古蹟者」。這種具體性質的材料，「可以呈於兒童之直觀」，「較之道德上抽象之教訓，反為易解」。能循此一原則，「則唱歌科庶不致為修身科之奴隸，而得保其獨立之位置歟」！^⑩

王國維這裏的意見，是中國近代音樂教育理論上的一個新里程碑。他對音樂美學了解之深刻，在他同時代的人之中，無出其右者。他把章程對音樂和唱歌科的認識，推進了一大步。王氏提出的有聲無詞的音樂之價值，以詠自然之美及古蹟的古詩為材料，反對乾燥拙劣的道德教訓，以及力主音樂之不應為修身科之奴隸，都是空谷足音的新鮮看法。

以上所提音樂不應為修身科之奴隸一點，尤其重要。王氏早先雖然主張美育應為德育之助，可是他從不認為音樂藝術只是道德的婢女，扮演一種拙劣的次等角色。相反地，他認為藝術在道德上唯一的功效，是在無形之中，憑它潛移默化的力量，把人的精神提昇到一更高的純潔完善之境。不但如此，王國維在最後檢討藝術和道德的價值時，終於承認兩者並無高下從屬之分而是兩者同時完成的一種至高境界。人的內心到了最高的理想之境時，其美麗之心及道德之心，同時臻於高尚純潔而不可分離。下面的一段文字，可以視為王氏對於藝術和道德之關係的最後的成熟見解。

泰西自雅里大德勒以後，皆以美育為德育之助。至近世譴夫志培利赫，啟新等皆從之，及德意志之大詩人希爾列爾出而大成其說，謂人日與美相接，則其感情日益高而暴慢鄙俗之心日益遠。故美術者，科學與道德之生產地也；又謂審美之境界，乃不關利害之境界。故氣質之欲滅而道德之欲得由之以生。故審美之境界乃物質之境界與道德之境界之津梁也，于物質之境界中，人受制于天然之勢力；于審美之境界則遠離之；于道德之境界則統御之。由上所說，則審美之位置，猶居于道德之次。然希氏後日更進而說美之無上之價值，曰：如人必以道德之欲克制氣質之欲，則人性之兩部，猶未能調和也。于物質之境界及道德之境界中，人性之一部必克制之，以擴充其他部。然人之所以為人，在息此內界之爭鬭而使卑劣之感躋於高尚之感覺。如汗德之嚴肅論（rigorism）中，氣質與義務對立，猶非道德上最高之理想也。

⑩ 王國維，「論小學校唱歌科之材料」，頁289, 290。

最高之理想，存於美麗之心（beautiful soul）。其爲性質也，高尚純潔，不知有內界之爭鬭而唯樂於守道德之法則。此性質，唯可由美育得之。此希氏最後之說也。顧無論美之與善，其位置孰爲高下，而美育與德育之不可離，昭昭然矣。⁶²

王國維的思想，超越了以美育爲道德的工具的看法。在功利主義彌漫國中之際，王氏的見解，竟然成了二十世紀初年的絕響。可是他在中國教育思想史上的地位，並不因爲他沒有實際影響而受到絲毫的動搖。

三、對教育政策的建議

除了理論性的問題之外，王國維在實際教育政策方面，也有談經思慮的珍貴意見。最重要的，是他對於各級教育的先後次第問題，留學問題，高等教育之延用外國教師，以及教員是否應授以官職等的看法。

王氏在論教育的次第先後上，與時見大爲不同。當時談教育的，多以辦小學爲首要之務，而王氏則認爲大，中，小學應均衡發展而以大學爲最重要。他對於當時的時髦口號「平凡教育」（universal education），大不以爲然。他在1905年時說：

天下事，有言之有故，持之成理，而實無當於今日之急務者，則流行之平凡教育主義是已。⁶³

清末民初，國中幾乎人人都認爲小學是一切教育的基礎和救國的萬靈丹。奏定學堂章程說：「開通國民知識，普施教育，以小學堂爲最要。則是初級師範學堂，造就教小學之師範生，尤爲辦學堂者入手第一義」。⁶⁴ 教育世界於1905年有專文說：「不立小學，不能立中學；不立中學，不能立大學。故今日當務之急，在多立小學，而中學，大學圖之小學盡立之後，未爲晚也」。⁶⁵ 小學教育在他們心目中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爲他們認爲它是富國強兵的不二法門。蔣夢麟（1886-1964）回憶當時的教育界，把這種小學至上的思想，形容得淋漓盡致。

⁶² 王國維，「孔子之美育主義」，頁5-6。王氏所說席勒對於美和善的關係的澄清，在席勒本人的著作中和近人的美學著作中，都可以得到證明。關於席勒最後以平等綜合的態度對待美和善，見Schiller, pp. 131-140，也即是美育書簡中的最後一封信。近人Beardsley，也指出，席勒雖然沒有澈底解決美和善之間的關係，不過他在美育書簡的後半部，却明白主張美的本身即是人類最高境界的一部分，而不是達到這一最高境界的最後一個階段，pp. 229-230。

⁶³ 王國維，「論平凡之教育主義」，教育世界，期97（1905年4月）。收入王靜庵文集，頁265。

⁶⁴ 奏定學堂章程，頁49。

⁶⁵ 轉引自王國維，「論平凡之教育主義」，頁265。

我們以前聽了俾士麥說，德國的強盛，是小學教育的功，所以我們也來辦小學，以為小學堂辦幾千個，中國就強了。後來聽說日本的強盛，也從小學教育得來的，所以我們大家都信小學教育好像一瓶萬應如意酒，一粒百病消散丸，靈驗無比，吃了就百病消散。⁶⁶

至於小學教育，何以會有如此的功能，則少有人作過透澈的思考。如果中國舉國皆是受過小學教育的人，是否國家便有了能擔當重任的人才？小學教育，只是培育人材的開始，而時人之中，竟有人以終點視之。這種小學教育至上的心理，可以看出在千頭萬緒的困境之下，人們急燥浮淺的心理。同時也證明，因為近代化在中國是一項沒有過去的經驗和智慧可以依憑的新挑戰，所以人們的思想，不無幼稚及違反常識之處。

王國維對於這種小學教育至上的理論，大加批評。王氏承認，小學教育普及，當然有助於國家的興盛「德之勝法也，大將毛奇 (General H. K. B. von Moltke) 以其功歸之小學校教師，吾人不敢不謂普(魯士)之強大，半歸於普通教育之力」。不過他馬上又指出，毛奇的話，我們不能以咬文嚼字的態度來解釋。這一句話，或許「乃出於功成不居者之自道」，而並沒有特別深入的意義。⁶⁷ 王氏認為，小學教育的功能，是有它的限度的。他問道：

由此平凡主義，即使小學偏立於全國，愚民之知識當稍勝於前日，至於經國體野，扶危定傾之人才，又何從得之哉？⁶⁸

不但如此，而且從邏輯的層次來說，

欲興小學，則不可無小學之教師，而小學之教師，非受中等之教育者不能為也。欲興中學，不可無中學之教師，而中學之教師，又非受高等之教育者不能為也。故初等，中等，高等之教育，三者當並行而不當偏廢。今日之要務，在一面興普通教育，一面招集年長才秀之生徒，先與以必要之預備而授以專門之學術，庶足以理萬端之新政而供中學之教員。事無亟於此者矣！⁶⁹

既然大學教育是中，小學教育的基礎，所以「主張初等教育者，為平凡主義，顛倒

⁶⁶ 蔣夢麟，「什麼是教育的出產品」，新教育，卷2期3（1919年11月）。收入蔣夢麟，過渡時代之思想與教育（臺北，世界書局，1962），頁67。

⁶⁷ 王國維，「論平凡之教育主義」，頁266。

⁶⁸ 同上註，頁267。

⁶⁹ 同上註。

主義」。⑦

王氏雖說大，中，小學教育，應當三者並行，而他真正著重的，無疑地是高等教育，因為他認為真正創造文明，建設社會的，仍是極少數的高等人才。他於1905年說：

天下之事，多出於英雄之手，蚩蚩者直從風而靡耳。教育不足以造英雄與天才，而英雄與天才自不可無陶冶之教育。高等教育之責任，在使英雄與天才得其陶冶之地而無夭閼之虞。今以國事之亟而人才之乏，則亟興高等之教育，以蘊有一二英雄天才於其間，而其次者亦足以供驅策之用。⑧

王氏直認，這是一種「貴族主義，但所謂貴族主義者，非政治上之貴族主義而智力上之貴族主義也」。⑨不過他馬上辯護說：

以今日人才之取之如彼，而國家待用之亟如此，則育才之方法，未有適於此者也。故貴族主義，今日最適之主義也，況其餘潤所及，又足以立中學，小學之根基乎！⑩

這裏必須指出，王氏所說的智力之貴族主義，其遠源出於中國儒家的士大夫的精華主義，其近源則出於叔本華和尼采。叔氏在其著作中，再三致意他的智力的貴族主義(*intellectual aristocracy of nature*)。世上千萬個庸夫俗人之中，只有一兩個智力的王子和貴族足以領導羣倫。⑪尼氏說，人類的希望和目標，寄託在最高等的人身上。因為這種貴族主義，所以他極端反對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量是不足道的。如果貝多芬只有一首傳世的交響樂，莎士比亞只有一部名山之作，也已足夠使他們兩人不朽了。⑫

儒家的成分之一，是它的貴族式的社會哲學。知識分子被目為國家的中堅，社會的棟樑。他們要先天下之憂而憂，而庶民則只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這種思想便是西方學者所說的儒家的精華主義(*elitism*)。王國維的個性，便是這種精華式的。因為這種思想已在他的潛意識裏，所以當他讀到叔本華和尼采的智力的貴族主

⑦ 王國維，「教育普及之根本辦法（條陳學部）」，*教育世界*，期136（1906年11月）。收入王靜庵文集，頁272。

⑧ 王國維，「論平凡之教育主義」，頁266。

⑨ 王國維，「教育小言十二則」，*教育世界*，期117（1906年1月）。收入王靜庵文集，頁246。

⑩ 同上註。

⑪ Schopenhauer, II: 145-147.

⑫ Walter Kaufmann, *Nietzsche: Philosopher, Psychologist, Antichris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149-152.

義時，馬上就有深獲我心之感。他1904年的「叔本華與尼采」一文，大部分即在討論和比較二氏的貴族主義和天才論。在這兩點上，他所受叔氏和尼采的影響，是很明顯的。^⑯

王國維，叔本華和尼采在智力的貴族主義上，看法是相同的。他們三人所注重的，都是天才的培養，精神的提昇，和文化的創造。王氏對於中國的貧苦和實際的需要，當然是萬般關切的。所以他會說：「以專門之學術……理萬端之新政」的話。這些話，看似功利，卻不可以當時的一般功利思想衡量。我們已經一再指出王氏的非功利思想。其實他這裏的話，與他的非功利主義，並無真正的牴觸。他所說的新政，實是一種新學術，新思想所培育出來的一種新氣象。所以他一面說「理萬端之新政」，一面嘆息當時治學的人，為功利所誘，而不知學與藝的分別。

今之學者，其治藝者多而治學者少。即號稱治學者，其能知學與藝之區別而不視學為藝者又幾人矣？故其學苟可以得利祿，苟略可以致用，則遂置然自足，或以筌蹄視之。^⑰

王國維在這種對待高等教育的態度之下，極力反對奏定學堂章程學堂教員列作職官的奏議。^⑱王氏痛斥國人迷戀官職的心理，並說這種獎勵，實際是在「剿滅學問」。中國真正需要的，是「使道德，學問，實業等有獨立之價值，然後足以旋轉社會之趨勢」。^⑲

我們從以上的討論可以看出，王國維所注重的，是獨立的新思想和新學問的養成，從而造成一個新的社會趨向。他對於眼前實用的問題，殊少興趣。

最後，我們要討論高等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環，即師資的來源問題。前文王國維提過，大學培養中學師資，而中學培養小學師資。那麼大學的師資又從何而來呢？王氏也已有了答案。他於1906年說：

難者曰：「如子之說，則今之小學，中學既無教師矣，則高等教育之教師又

⑯ 王國維，「叔本華與尼采」，*教育世界*，期 84 (1904 年 10 月)，期 88 (1904 年 10 月)。收入王靜庵文集。「叔本華與尼采」一文的取材，叔氏方面，主要是他的 *The World as Will and Representation*。尼采方面，則主要是尼氏的 "Thus Spoke Zarathustra," in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The Portable Nietzsche*,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68) 王氏受叔氏的影響較受尼采的影響為大。這一點，從「叔本華與尼采」一文及王氏其他文字中，都可以看出。不過細節在此處不擬討論。

⑰ 王國維，「教育小言十則」，*教育世界*，期 150 (1907 年 6 月)。收入王靜庵文集，頁 261-262。

⑱ 奏定學堂章程，頁 76。

⑲ 王國維，「教育小言十三則」，*教育世界*，期 143 (1907 年 2 月)。收入王靜庵文集，頁 256-259。

烏乎取之？」曰：「此非用外人不可」。⁸⁰
在王氏看來，聘用外國教員，是理所當然的事。

今有人欲建一大工廠，則其機器鍋爐必購諸外國，未有用舊日之器械者也。
苟我國自有適用之器械，合格之教員，豈不甚善！其如今日之絕無，何而言
者談及用外人輒以爲懼。⁸¹

王氏所說「談及用外人輒以爲懼」，的確是當時一般人的心理。奏定學堂章程
中說，如各省中學堂以上有聘用外人的，需明定其權限，以免他們干預校務。又外
籍教員中如有教士出身的，不得借詞宣講。⁸² 王氏說：「夫外人者，當事者之所患
也，患其侵教育權也，患其不得其人也，患得其人而不爲用也」，⁸³ 恐怕一部分即
是指章程三作者的憂慮。然而他對於這些，卻認爲都不足爲患，因爲

用舍之權在我，則權何自而侵？至後二者，唯監督者之不得其人斯有之耳。
然以觀今日監督學堂之人，則其於本國人未必能用之，況外人乎？以監督者
之不得其宜而謂外人之不可用，則未免因噎而廢食也。⁸⁴

晚清末年，外籍教師和西洋傳教士對於中國教育的近代化，當然有他們的貢
獻。可是另一方面，他們對中國教育權的侵害，傳教士在學校傳教對學生心理的影
響等，也是不容否認的事實。王國維對於外籍教師所帶來的不良後果，居然毫無所
動，與時人的感受，大相逕庭。這可以從兩方面來解釋。第一，王氏對於問題的概
念留意較多，而對於問題的細節則常能保持一定程度的心理上的距離。因爲如此，
所以他對外籍教師所引起的種種問題，不若一般人看待得一樣嚴重。第二，王氏的
思想，趨向大同主義。民族主義對他在感情上和思想上，幾乎沒有支配的力量。因
此他對於外籍教師之侵害中國權益和傷害國人的民族自尊心，感受也遠不若一般
人的強烈。因爲這兩個原因，所以他會說，外籍教師問題的癥結，在於國人是否用人
得當及監督是否得宜。

如果我們把王國維對外籍教師的態度和另一個相關的問題——留學問題——作
一比較，則我們不難看出，他認爲聘用外籍教師，只是短期的權宜之計，而留學問

⁸⁰ 王國維，「教育小言十二則」，頁247。

⁸¹ 王國維，「教育小言十則」，教育世界，期137(1906年11月)。收入王靜庵文集，頁253。

⁸² 奏定學堂章程，頁77。

⁸³ 王國維，「教育小言十二則」，頁247。

⁸⁴ 同上註。

題，卻有根本解決的必要。他在1906年時感嘆說：

留學生之數之多，如我中國之今日，實古今中外之所未聞也。通東西洋之留學生，數不下萬人，每人平均歲以五百元計，則歲須五百萬元。以此五百萬元興國中之高等教育，不虞其不足，即令稍有不足，其受教育之人數，必倍於今日之留學生之數無疑也。[◎]

要遏止這種留學的狂潮，唯有借用外洋的人才，替中國的高等教育打下基礎。一旦中國的高等教育有了基礎，外籍教師的問題，也便迎刃而解了。王國維在1906年底條陳學部說：

竊謂學部宜以全國之高等教育爲已直轄之事業。除於京師之大學堂整頓擴充外，至外須於保定、西安、武昌、成都、江寧、廣州六處，置大學或專門學校，悉聘外人以爲教師。而選拔生徒之稍受教育，才質聰穎，國文通暢者，與以相當之預備（外國文及數學，自然科學）而授以專門之學，或附設優級師範於其中，或就他日生徒之已卒業而有爲中學師範學校教師之志向者，授以教育、教授等學，庶五、六年以後，中學及師範學校之教師，可得而有矣。其尤俊者，則選之使留學外國以備他日大學教授之選。則十年以後，客卿可得而辭矣。[◎]

在同一年裏，王氏又分析中國留學問題之根本解決之道和高等教育之最終的獨立問題。他說：

高等教育既興，則外國留學可廢，以後海外留學生，限於分科大學卒業生中選之，以研究學術之闡奧。全國官費生以百餘人爲額，私費者聽之。其大學中未設立之科，則亦得委託外國大學教授。以後分科大學之教師，漸以大學卒業後之留學生及學力與之相等者代之。如此十年，則分科大學中，除授外國語學外，可無以外國人而擔任講座者矣。此永久之策也。[◎]

我們從這裏的討論，可以看出王國維呼籲和鼓吹發展高等教育的另一個原因。高等教育不但可以陶冶和幫助養成天才，不但可以訓練「理萬端之新政」的專門人才，同時也是中、小學教育的基礎。這些在上文都已有了交代。不但如此，而且中國的高等教育興旺之後，外籍教師可得而辭，而留學也可因之而廢止。換言之，發

[◎] 同上註。

[◎] 王國維，「教育普及之根本辦法（條陳學部）」，頁273。

[◎] 王國維，「教育小言十二則」，頁247。

展高等教育是使中國的學術獨立和發展中國自己的文化的首要之道。王氏雖然沒有時人強烈熱情的民族主義，然而他對於中國文化學術的獨立和拓展之關切，比之時人，恐怕尚且有過之而無不及。

外籍人士來華任教，是清末民初的大問題；留學問題，是百年以來中國的高等教育和文化上最大的問題之一。而在這兩個問題上，王國維都能提出與眾不同的解決辦法。王氏對於外籍教師在中國教育界所帶來的弊端，雖然遠不如一般國人感受的強烈，然而他卻十分瞭然，外人來華任教，只能是過渡時期不得已的辦法而絕非永久之計。他的目標，是在十年之內，「客卿可得而辭」，而以後的外國教師，只限於各種外國語的教授。他雖然無一語及於任用外人任教之不當，可是他最後的大目標，是難以非議的。

王國維說，中國留學生的人數之多，「實古今中外之所未聞也，通東西洋之留學生，數不下萬人」，決不是信口而言的數字。王氏的慨嘆，發於1906年，當年中國的留日學生，已有七二八五人。1905年，約有八千左右。⁸⁸如果合計留學歐美的，數字當然更不止此。而且中國留學生的數目，有增無已。庚款退款和民國以來，中國留學生遍佈北美、歐洲，和日本，中國成了世上有史以來派遣留學生最多的國家。任何一個國家和社會，都應該發展自己獨立的高等教育，培養自己的領袖人才，維護自己國民的自信和自尊。中國的留學生達到如此驚人的數目，反應了中國高等教育之不振，政治之腐敗，社會的解體，和整個國家之失去知識份子的向心力。所以留學問題，是國家整體性問題之一環。王國維的建議，是否能矯正國人對歐美的崇拜和嚮往，是否能遏止留學的狂潮，是大有問題的。但是我們還是要指出，王氏是當時最早指出留學問題的嚴重性的少數人之一。而他所提議的辦法，不一定能挽回狂瀾，卻不失為一個解決此一大問題的合理的起點。

四、對高等教育的貢獻

王國維在教育理論和問題上的著作既然如此之多，所以聲名著於鄉里。1906年底，他返浙江海寧奔父喪時，鄉間的地方領袖要他出任當地勸學所的總董。可是王氏是理論家而不是能擔當行政責任的改革家。他堅拒地方鄉先生之請，並列舉各種理由，如地方上的設備不够，教育賦稅的制度尚未建立，以及師資缺乏等重重困

⁸⁸ 董守義，清代留學運動史（瀋陽，遼寧人民，1985），頁197, 266。

難，所以「雖欲不辭，其可得乎」！^⑨

王氏不願擔負教育行政責任，可以從兩方面來看。一是儒家的士大夫意識(elitism)。儒家的最高典型，當然是從修身、治學，到理財、練兵無所不能的通才。近世的曾國藩等，是最顯著的例子。可是在另一方面，儒家文化所強調的，是道德的修養，對人物的品評，和對事理的判斷。而在行政方面，則至多只限於一般性和常識性的討論。又因為對於修身的強調，所以明哲保身，在潛意識之中是很重要的。儒家文化對於知識份子從政，態度上有其曖昧之處。一方面是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而另一方面對於在政治上有野心抱負的人的動機，又持懷疑之心。王氏在思想上早已邁出了儒家文化的限制，然而在潛意識的個人行為上卻仍是十分典型的儒家士大夫。他在理論的討論和事物的觀察方面，觀念的新穎，不愧為一代奇才，然而對於擔負行政責任，則深為戒懼。他在推辭海寧鄉先生之請時，態度極為堅決。

第二，王氏不願介入教育行政，也可從他個人的興趣來解釋。1906年底海寧的鄉先生邀他出任學務總董時，他的興趣仍在西方哲學思想方面。1907年以後，他雖然放棄了哲學，興趣卻轉到了文學創作方面。而且他真正的注意力之所及，在高等教育而不在辦理小學教育的總董。所以他說，除了他提到的種種困難之外，「且某尚欲研究學問，又將有四方之役，未能以身委諸一邑之公益也。」^⑩

王氏在小學教育行政方面，雖然袖手不問，可是他在高等教育教學方面的貢獻，不次於他在教育理論方面的貢獻。他所謂的「四方之役」，一部分即是指他在1906年前後幾年中在高等教育界的活動。1903年初，王氏受聘往江蘇通州師範學校任教，主講心理學和邏輯。通州師範是清末實業家張謇在中國所創第一所師範學校，而王氏卻是該校近代學問的主講人。1904年7月，羅振玉受當時江蘇巡撫端方之命，在蘇州創設師範學校。王氏得羅氏之邀，轉往蘇州師範，主講心理學，社會學，和邏輯。1907年春，王氏在海寧居喪完畢，得羅氏薦，至學部總務司行走，並兼充學部圖書局編輯，主持編譯及審定教科書等事。1909年秋，外部與學部考試留美學生，王氏為閱卷官。同年十月底，學部奏設編定名詞館，派嚴復為總纂，王氏為名詞館協修。^⑪

^⑨ 王國維，「紀言」，教育世界，期135（1906年10月）。收入王靜庵文集，頁285-287。

^⑩ 同上註，頁287。

^⑪ 有關王國維這幾年在教育界的活動，參看趙萬里，「王靜安先生年譜」，王國維，王觀堂先生全集，冊16（臺北，文華，1968），冊16，頁7056-7064；王德毅，王國維年譜（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7），頁18-60。

王國維這幾年之中，不是在當時中國最新式的高等學府教授最新的學科，便是在全國最高的教育行政機構擔任學術的編譯和編輯工作。王氏在這幾年之內，同時也完成了幾部重要的翻譯。

據日人須川照一的估計，王氏自1900年起，七、八年內，共譯有英、日文著作十七種之多。不過須川所列的，有幾頁的短文，有與思想文化關係不大的著作，也有譯者不確的。[◎]此處參考須川及其他資料，僅就我們大致能斷定出自王國維所譯之重要文史的英文著作，略為討論。

據須川的研究，教育叢書的廣告欄，於1905年有下列的一段廣告：

哲學之書，譯者甚罕。間有譯者，亦罕善本。本社特請專攻此學之王國維氏譯成哲學概論一部，心理學一部，倫理學一部。復由王君作中西學語對照表，附之書後，以供學者之便……。欲知宇宙人生之為何物者，不可不一讀也。[◎]

須川推斷，哲學概論即是德人巴爾善的著作（Friedrich Paulse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由教育世界社刊行。此一推論是合理的。在王氏所閱讀的英文哲學著作之中，名為哲學概論的，只此一部。他在「叔本華之哲學及其教育學說」一文中討論叔氏的意志論時，援引巴氏哲學概論一書中“Intellectualistic and Voluntaristic Psychology”一節頗多。[◎]則王氏對巴氏一書的內容，知之頗詳。教育叢書的廣告，是指巴爾善之著作，當無疑問。王氏不諳德文，必定是據英譯本轉譯，而英譯本的正文，有四百頁以上。王氏所譯，乃巴氏全書或其中某些章節，因爲譯文不見，這些問題，此處無法解答。

教育叢書廣告中所說的心理學，當是丹麥心理學家海甫定的心理學概論（Harald Höffding, *Outlines of Psychology*）之一部份。該書全譯本之出版，已是光緒三十三年六月（1907年7月）的事了。[◎]須川顯然未見該書中譯本，故而誤認該書全譯本已於1905年問世。教育叢書廣告中所指的倫理學，據須川的研究，是

◎ 須川照一，「上海時代の藤田劍峯，王國維雜記」，東方學，期 66 (1983年7月)，頁107-108。

◎ 轉引自須川照一，頁108。

◎ Hermann Kogelschatz, *Wang Kuo-wei und Schopenhauer, eine philosophische Begegnung: Wandlung des Selbstverständnisses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unter dem Einfluss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Ästhetik* (Stuttgart, Steiner-Verlag-Wiesbaden-Gmb H, 1986) Chap 2 中，討論此點甚詳。

◎ 王國維譯，心理學概論，冊2（上海，商務，光緒33年6月（1907年7月））。原著 Harald Höffding, *Outlines of Psychology*, 王氏乃自英人龍特氏丹麥文之英譯本轉譯。此書光緒33年之版本，現藏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圖書館。

王氏翻譯英文模阿海特的倫理學概論，也印行於1905年。不過此書何處出版，模阿海特的英文原名，我們都不得而知。1907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王氏官學部時，又譯有耶芳斯的辯學(William Stanley Jevons, *Elementary Lessons in Logic: Deductive and Inductive*)。翻譯邏輯，本身便是一項十分艱辛的工作，而晚清末年，這一方面的術語和名詞，遠談不上統一，對邏輯的概念，也缺乏基本的了解，所以翻譯的工作，必定難上加難。王氏是否譯出耶氏全書，是有問題的。趙萬里說，辯學「乃從…*Elementary Lessons in Logic* 中譯出」。^⑨「從……中譯出」的語氣，使我們懷疑，王氏所譯，或許只是全書之某些章節。因為不見譯文，所以一切暫時存疑。1910年，王氏譯有美國教育心理學家祿爾克的教育心理學。^⑩

王國維的幾種翻譯，在當時都是劃時代的貢獻。心理學概論是西文心理學的著作在中國最早的譯本之一，只有光緒十五年(1889)和光緒三十二年(1906)的兩部西文翻譯早於此書。^⑪而且王氏的翻譯，歷久不衰，到了本世紀二十年代後期，仍在通行。^⑫譯介西方邏輯，王氏也是開風氣之先的人。1905年，嚴復譯有彌爾的名學(John Stuart Mill, *Logic*)的前半。1909年又出版所譯耶芳斯的名學淺說。^⑬王氏翻譯耶芳斯的辯學，與嚴譯同一時間，則二氏同是譯介近代西方邏輯的功臣。據錢存訓統計，國人自十九世紀中葉至1899年，所譯西文之哲學書籍共六種(均為英文)；1902至1904年間，所譯西文哲學著作共十二種(英文十一種，德文一

^⑨ 據趙萬里，「王靜安先生著述目錄」，王觀堂先生全集，冊16，頁7177，此書乃王氏官學部圖書局時所譯，有學部排印本。

^⑩ 馬文駒，「清末民初心理學譯著出版中的若干問題」，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年)，頁43，謂此書譯本由學部圖書局出版，唯譯者不詳。佛離，王國維詩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1987)，頁406，則謂此書乃王氏所譯。按此書乃王氏所譯，確有可能。王氏自1903年起即開始講授心理學。1907年起，又在學部圖書局任編譯，負責編譯及審定教科書，而此書正由學部圖書局出版。馬文駒及佛離未註明書名及作者之英文原名，所以此處的譯名，均無法還原。趙萬里，「王靜安先生著述目錄」，頁7177，說王氏譯有日本法學家磯谷倅次郎的法學通論，有商務印書館印本。唯商務印書館圖書目錄，1897-1949(北京，商務，1981)未列此書。趙萬里不但是王國維的同鄉後輩，也是王氏在清華研究院的學生，1925年夏天起，即住王氏家中，所以對於王氏的一切，最稱熟悉。王氏自盡後，所有的著作，都由趙氏整理並編目。見趙氏致陳乃乾信，載陳乃乾，「關於王靜庵先生逝世的史料」，王觀堂先生全集，冊16，頁7155, 7159。法學通論一書，恐係趙氏記憶有誤。另外須川推測說(頁108)，王氏亦譯有洛克的人間悟性論(John Locke,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由教育世界譯載。此一推測，在沒有其他有力的證據時，必須存疑。案教育世界刊載此文時，並未署明譯者，而且在其他研究王國維的文字之中，均未提及此一譯著。

^⑪ 見馬文駒，頁42-43。

^⑫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之藏本，即商務印書館1926年印本，乃該書第八次印行。

^⑬ 嚴復集，冊5，頁1581。

種）。^⑩ 則王國維1905年所譯巴爾善之哲學概論，乃當時少數西文哲學著作之中譯本之一，其重要性可見。

王國維在學部名詞館任協修時的工作內容，我們不得而知。不過我們可以斷言，他擔任斯職，是當之無愧的。當時名詞館的重點，已日益放在英文名詞術語的翻譯工作上，而王氏在這一方面的造詣，是舉國之中的佼佼者。早在1905年，他即發表他對譯介西方名詞術語的看法，見地不凡。^⑪ 王氏的英文，大半自修得來，一生從未涉足西洋，然而他的功力，不讓於留學英國的嚴復。王氏在名詞館任協修，自1909年10月至1911年10月辛亥革命亡命日本止，前後兩年。可惜我們對他的工作已無從考查。

綜觀王國維在教育理論上的見解和他在高等教育教學方面的貢獻，說他是百年來中國教育史上傑出的人才之一，絕非過譽。

^⑩ Tsuen-hsien Tsien, "Western Impact on China Through Translation," *Far Eastern Quarterly*, 13.3 (May, 1954) 315-319.

^⑪ 王國維，「論新學語之輸入」，*教育世界*，期96（1905年4月）。收入王靜庵文集，頁225-230。